

劉以鬯：從上海到香港

—— 解讀《過去的日子》、《露薏莎》、《對倒》中的大陸想像

● 楊克銓

一、《過去的日子》

劉以鬯，原名劉同繹，字昌平。1918年11月7日出生於上海。從出生到1948年金融大混亂離滬到港，三十年的時光，除了短期在重慶之外，大部分都在上海度過的。毫無疑問，上海在劉以鬯的生命裏留下了畢生都難以磨滅的印記。而閱讀他的小說，我們的確一次次發現上海形象在他的故事裏顯現。

細讀《過去的日子》（1963年發表於《星島晚報》，原題《離亂》）這部長篇小說，可以深切的體會到作者在摹擬現實，還原歷史物境方面所下的功夫。正如標題所言，寫於六十年代的這個小說，是作者站在六十年代的立足點上，對過去的四、五十年代生活經歷所作的片段式的集中再現和反觀。表達的是作者對於完整的生命軌跡在戰爭的破壞之下趨於支離破碎的無奈，以及對於離亂時代個人命運的脆弱和無力的慨歎。

小說的主人公“我”，受過良好的教育，計劃著自己出國留學的美好前程。在畢業典禮上，與大學時代沒有講過一句話的女同學史宜南偶然的際會，有可能走向一個幸福的結合。在小說的前半段，通過主人公的眼睛，劉以鬯給我們描繪的是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充滿都市氣息的繁華圖像。即使抗日戰爭已經進入第四個年頭，滬戰也早已爆發，人們仍然可以在租界裏保持自己的現代的生活方式，可以去大光明看電影，可以去霞飛路的俄羅斯餐廳進晚餐，可以去聽音樂會，可以去百樂門跳茶舞，可以在情調盎然的都市裏談著風花雪月的愛情，夢想似錦的前程。租界成了

那個年代的保護傘，在它的庇護下個人的生活仍然保持著繁華和完整。可一旦日本軍隊進入租界，“孤島”陸沉，打破了這平靜的一切。出國留學的計劃落空，愛情因為勢利的衝擊而瓦解，個體生命被無條件的嵌入時代的洪流當中。

“我”不得不逃亡內地重慶，投身報社的工作，並一再的處於動蕩的生活境遇，從重慶回到上海，再從上海南下香港，輾轉新加坡、吉隆坡再返回香港。當中與史宜南的幾次相遇，都如同“我”顛沛流離的境遇，最終沒有落實到一個安穩的去處。即使娶了和史宜南酷似的張秀英為妻，也沒有得到料想當中的幸福，最後和電影明星跑了，輾轉各地追求的辦報事業也終究沒有一個光明的前景。

在離亂的大背景下，劉以鬯小說中主人公個人命運的無著，個體生命在歷史洪流下的脆弱與無力，使得他筆下的上海在繁華熱鬧的同時，顯示出了獨特的品性和面向。它區別於張愛玲那種在“普通人中尋找傳奇”的另類都市寫法，也有別於白先勇那種不斷閃回上海，將它作為故事一抹滄桑的底色，以寄託繁華散盡的今昔之感的方式。當我們仔細檢索主人公“我”在那一個個年頭裏不同的生活遭際，劉以鬯和主人公的命運不止一次的交叉重疊，我們會如此強烈地感受到這個小說的自傳體色彩。因此，劉以鬯小說中借用一個個具體的物象描繪出來的上海，就是他自己曾經出生、生活的上海，他小說文本所敘述的上海如此接近他生命中的上海。於是我們可以再深一層的體會他前面的那段自述，他不僅僅是在給

杜撰的故事穿一件真實的罩衫，而且還是根據真實的生命體驗，通過虛構的人物和故事，將他們放置在自己熟悉的故土，上演自己的一段人生歷程。所以他大陸想像當中所書寫的上海形象，是建立在自我生命感受的反思基礎上，如實的去再現這個時空，儘量讓自己主人公生活和故事展開的這個環境變得真實可信符合史實。這應該是劉以鬯小說中表現出來的大陸想像的最大的一個特質。

當我們在關注劉以鬯的大陸想像，關注他對於上海所傾注的大量描繪筆墨的同時，再稍稍關注在《過去的日子》這個文本中，主人公南下之後的一段顛沛流離的境遇，將它連接起來當作一個整體來看，我們便能真正完整地理解了一個人的一段離亂生活，並能順著這個理解獲得對於劉以鬯小說創作的更深廣的視野。小說結尾處主人公發出了關於人生關於世界的一連串基本的疑問，“這些問題猶如走馬燈一般，在我的腦海中兜來兜去”。事實上，這些疑問就是在六十年代反觀四五十年代過去生活的劉以鬯腦袋裏兜來兜去。當我們在閱讀《酒徒》、《寺內》、《鏡子裏的鏡子》等等小說作品時，我們一次次和這些基本的問題相遇。這絕不是一種偶然。很明顯，《過去的日子》所集中反觀和再現的生命歷程，是作為一個起點，醞釀了今後那個以行吟的方式來理解和表現自身和世界的關係，揭示物化世界的荒誕、人的焦慮的劉以鬯。他們之間是前世和今生的關係，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因果邏輯。《過去的日子》也就處在了劉以鬯小說創作“濫觴”的那個位置，這個小說中展現的上海形象，也處於了劉以鬯小說大陸想像的核心位置。

二、《露薏莎》和《對倒》

《露薏莎》寫作於四十年代，表現的是四十年代的事情。故事講的是投身抗日革命事業的主人公“我”，在孤島上海過著堅定卻苦悶的生活，與一名俄裔少女露薏莎的偶然相識，產生了一段並不長久的愛情。這篇小說看上去很簡單，但這種簡單並不減少它在劉以鬯整個小說創作中

的重要性，在這個看上去簡單得有些概念化、圖解化的作品中，暗含了連接前世和今生這一歷史邏輯的最關鍵的一環。

與《過去的日子》中的主人公相比，這裏的“我”還居留於孤島上海，儘管從事的是抗日的危險工作，可並沒有顛沛流離的坎坷境遇。和露薏莎之間的情感關係也單純明亮得多，它指向的是一種彼此認同的幸福。整個故事開展過程中，沒有對未來的太多的疑問，和對生活的太多的無奈。相反的，他在積極的投身抗日革命事業的同時，也努力爭取自己和露薏莎的純潔愛情。即使是在露薏莎遇害之後，還用露薏莎的口吻，說出了“去吧，到大後方去，幫助你的祖國趕走暴虐的侵略者”這樣的話語。很顯然，兩個同樣在大陸想像的歷史舞臺下展開的故事，體現了作者不同的心態。這種差異最直接的來源，是小說作者所站立的歷史的立足點的不同。四十年代還停留於大陸，投身進步事業的劉以鬯，和六十年代南下香港，顛沛於東南亞的劉以鬯，顯然承載著不同的歷史內容，具有不同的眼光，和對待過往的心態。他所能看到的，想到的，和說到的生命歷史，在這二十年裏自然而然的累積和變化著。

然而，我們也發現了兩個主人公在文化身份（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青年），職業（新聞工作者，報業從業人員），生活的去向（同樣要去大後方）上面的一致性，以及《露薏莎》中的“我”之於《過去的日子》中的“我”的前傳色彩。因此，兩部小說在歷史的時空裏完成了對接。《露薏莎》中的“我”和《過去的日子》中的“我”，從此統一於一個延續的生命體。這個在動蕩年代的知識分子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一脈相承的漂泊者的形象，和他對社會現實一直持有的一種寥落的心境和憂鬱的心態。即使是在積極投身革命事業的青年身上，他也始終排遣不去這種漂泊的情緒，以及對社會表示懷疑的態度。這當然和主人公的知識分子身份密切相關，但背後起著邏輯推動力的，則是劉以鬯作為知識者的道義選擇，體現了他作為知識分子，對於社會的批判意識和人文關懷。上海，這個被他最大限度真實還原的大陸想像的對象，既作為母體孕育了

香江文壇

他的知識分子素養，使他在不同時期，不同處境下用這樣的一種充滿道義，充滿人文關懷的方式，去反省人的境遇；同時，又作為他最早反觀社會生活、個人境遇的空間，上演了個體生命和社會現實之間最初的碰撞，和由此產生的困頓和疑惑，孤獨和寂寥。在這裏，我們找到了連接前世和今生的邏輯依據。

度過童年和青年時代的上海，雖然離劉以鬯的香港生活越來越遠，但是它在劉以鬯的一生中，顯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就是在那個遙遠的年代，上海已經將劉以鬯的心竊去了，永遠在他的生命經驗裏，以不同的形式被反複記起，而小說中的大陸想像就是這其中之一。

《對倒》是比《過去的日子》晚發表近十年的作品，1981年修改後又以短篇形式發表。在兩個版本的開頭有這樣一段幾乎一致的敘述：

淳于白在這座城市已經住了二十幾年。二十幾年前，香港只有八十幾萬；現在，香港的人口接近四百萬。許多荒涼的地方，已經變成熱鬧的徙置區。許多舊樓，已經變成摩天大廈。他不能忘記二十幾年前從上海搭乘飛機來到香港的情景。當他上飛機時，身上穿著厚得近似臃腫的皮袍；下機時，卻見到許多香港人只穿一件白襯衫。……淳于白從北方來到香港，正是聖誕前夕。長江以北的戰火越燒越旺。金圓券的狂潮使民眾連氣也透不轉。上海受到戰爭的威脅，正在動蕩中。許多人都到南方來了。

時間往前推二十年，就是四十年代末，這裏對於當時大陸越燒越旺的戰火，對於金圓券的擠兌狂潮，對於上海的動蕩的回憶，以及初到香港是的陌生和不適，都讓我們再一次回到《過去的日子》當中的某一段過去的日子。那也是在上海，“聖誕前夕，上海人為了保值，傷透腦筋。起先當局不准平民藏有黃金美鈔，後來發生擠兌潮。”在戰爭的威脅下，越來越多的人打算走，離開上海，“我”對於貿然赴港還心存疑慮，生怕自己的積蓄無法在香港立足，而妻子張秀英卻堅持要去香港。而之後，到了香港樓價飛漲，謀生不易，又對應了《對倒》中淳于白初到香港的陌生和不適。很明顯，這裏也存在類似《露薏

莎》和《過去的日子》那樣，在情節和主人公命運的關聯或者說對接，如果說《露薏莎》與《過去的日子》完成的是在四十年代的對接，交代的是前溯的生命歷程，那麼在《對倒》和《過去的日子》的對接中，完成的是後續的一段生命的描述。當然，在考察這兩個前後的對接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某些差異的存在。在前一個對接中賴以構成的那些條件，在後一個對接中要淡化得多，淳于白儘管年輕時也是“獨個兒從上海跑去重慶參加一家報館的工作”，有過上海式的悠遊的生活方式，但現在卻是個靠拿租金過活的老人，整天四處遊蕩，下舊樓，進電影院，無所事事，只是“靠記憶來推動生活”。《過去的日子》當中的“我”和《露薏莎》中的“我”的血肉關係要比和淳于白的關係緊密得多，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完整連接這三個主人公的嘗試。正如在前面論及的，寫作《過去的日子》那個時代的劉以鬯頭腦裏兜來兜去的問題，指向他之後的一系列創作，為以後的創作路向定下了基調。在《對倒》中，淳于白對於身處的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的若即若離的關係，對於香港經濟起飛之後帶來的種種物象的疑問和焦慮，就詮釋了作為知識者的劉以鬯，在定居香港後面對商業社會的發展，現代文明的膨脹，所產生的疑問情緒。在《對倒》中，我們看到的大陸想像所書寫的上海形象已經不是那麼觸手可及，明亮而堅定。大陸想像成了一縷不絕的微弱香火，既凸現了它在劉以鬯小說創作和生命歷程裏的位置，又印證了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邏輯，用自己在小說中或隱或顯的面貌，見證著人的歷史，完成著自己的歷史。

通過考察，我們發現了在劉以鬯的小說創作中，上海書寫所佔據的位置，以及他自身在這個虛構的過程中，在不同的人物，不同階段的歷史地理環境中，所呈現出來的一脈相承的生命。可見生於上海，長於上海的作家劉以鬯，大陸的想像以他對上海難以忘懷的姿態，呈現在他的作品中。●